

国外毛泽东研究译丛（第二辑）

主编 石仲泉 萧延中

Rethinking Mao
Explorations in Mao Zedong's Thought

再思毛泽东

毛泽东思想的探索

（插图本）

[澳] 尼克·奈特 著

Nick Knight

闫方洁 等 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本书经中共中

国外毛泽东研究译丛（第二辑）

主编 石仲泉 萧延中

Rethinking Mao

Explorations in Mao Zedong's Thought

再思毛泽东

毛泽东思想的探索

（插图本）

〔澳〕尼克·奈特 著

Nick Knight

闫方洁 等 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再思毛泽东：毛泽东思想的探索：插图本/（澳）奈特著；闫方洁等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 8

（国外毛泽东研究译丛/石仲泉，萧延中主编. 第2辑）

ISBN 978-7-300-19896-5

I. ①再… II. ①奈…②闫… III. ①毛泽东思想研究 IV. ①A8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189549 号

国外毛泽东研究译丛（第二辑）

主编 石仲泉 萧延中

再思毛泽东

毛泽东思想的探索

（插图本）

〔澳〕尼克·奈特 著

闫方洁 等 译

Zaisi Maozedong: Maozedong Sixiang de Tansuo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电 话 010-62511242（总编室）

010-82501766（邮购部）

010-62515195（发行公司）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涿州市星河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170mm×240mm 16 开本

印 张 17.5 插页 2

字 数 301 000

邮政编码 100080

010-62511770（质管部）

010-62514148（门市部）

010-62515275（盗版举报）

版 次 2015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48.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国外毛泽东研究译丛”编委会

顾 问	逢先知	龚育之	冷 溶	朱佳木
	李忠杰	金冲及	石仲泉	李君如
	李 捷	陈 晋		

主 编	石仲泉	萧延中		
编 委	(按姓氏笔画为序)			
	牛大勇	石仲泉	许纪霖	朱学勤
	任剑涛	杜 蒲	张小劲	张 宁
	张 鸣	李向前	宋新宁	周蔚华
	郑 谦	庞 松	贺耀敏	高 华
	黄嘉树	萧延中	景跃进	程 农

总 序

毛泽东是举世公认的 20 世纪最为重要的政治家、革命家和思想家之一，同时也是一位天才诗人。由于他对现代中国之思想、制度和社会产生的深刻影响，也由于他对建构 20 世纪国际政治格局做出的重要贡献，几十年来，对毛泽东本人及其思想体系的研究已经成为一个具有长久意义的学术领域。毛泽东不仅是属于中国的，也是属于世界的。尽管国外的毛泽东研究在理论目标、分析方式、社会功能和学术立场等方面与国内存在差异，但在全球化的宏观视角下，其研究成果，应当被看作整体毛泽东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们与国内毛泽东研究一起，对这一学术领域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基于这样的一种视阈和理解，我们在众多国外毛泽东研究的学术著作中，精选翻译了部分佳作，编成“国外毛泽东研究译丛”，以纪念这位旷世伟人，并进一步推进毛泽东及其思想研究的深入扩展。我们选译的基本原则是，站在 21 世纪全球化的历史视野上，严格遵奉学术理据和研究逻辑，精选经过历史检验，具有较强理论价值和持久性影响，持论较为公允客观，论说严谨缜密的名著。对于那些具有严肃治学精神和审慎推理论证的作品，即使与我们的学术观点不尽一致，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观念冲突，也在选择范围之内。“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我们希望把这一睿智古训真正转变为学术行动。

“国外毛泽东研究译丛”是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政治学系“中国政治研究”课题的一个子项目，是这个教学科研共同体集体努力的成果之一。我们期望这次翻译的几部著作不是译介编研工作的结束，而是一项系统科研工程的开始。我们愿意把这项工作继续下去。

在“国外毛泽东研究译丛”出版之际，我们首先感谢以下诸教授：

本杰明·I·史华慈 (Benjamin I. Schwartz)；

斯图尔特·R·施拉姆 (Stuart R. Schram)；

魏斐德 (Frederic Wakeman, Jr.)；

莫里斯·迈斯纳 (Maurice Meisner)；

约翰·布莱恩·斯塔尔 (John Bryan Starr);

布兰特利·沃马克 (Brantly Womack);

罗斯·特里尔 (Ross Terrill);

杨炳章 (Benjamin Yang)。

这些教授不仅慷慨允诺让我们翻译其各具特色的学术名著，而且其中不少人专此为“国外毛泽东研究译丛”撰写了“中文版序言”，这无疑是对我们的信任和支持。

国内毛泽东研究的著名学者逢先知、龚育之、冷溶、朱佳木、李忠杰、金冲及、李君如、李捷和陈晋等教授，不仅慨然允诺担任本译丛的学术顾问，而且多次对翻译工作给予指导，这对我们是极大的鼓舞。李君如教授还就统一国外著者的译名作了专门指导，使翻译工作避免了不少差错。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一编研部的专家们，在学术方向上的直接指导以及在史料的校译、勘误方面所提出的大量关键性意见，使本译丛的质量有了进一步提高。来自国家社会科学研究机构和著名高校的编委们，从不同学科的多元视角，为选编工作提出了许多中肯的意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原“国外研究毛泽东思想资料选辑”编辑组工作人员此前的开拓性研究和贡献，不仅给予编选诸多经验和启发，而且直接为具体的译介工作提供了宝贵的便利条件。在此，我们向上述所有关心、支持本译丛的学者和单位以及图片的提供者，一并表示由衷的谢意。

对书中出现的引文，编译器采取如下的文献处理原则：凡国内有对应的公开发表的毛泽东著作者，均已按中文版本原文进行了核校；凡确属毛泽东文稿，但未公开发表者，按相关文献进行了核校，如凡引用日本学者竹内实主编《毛泽东集》和《毛泽东集》补卷者，按该书进行核校；凡属不能确定是否为毛泽东著作的引文，则尊重原作者的引文，未加处理，如凡引用《毛泽东思想万岁》和国外报刊报道的文献，一律按外文原文译出。

译介工作本是一件永远达不到尽善尽美境界的苦差，语际书写过程中的误读、遗漏和错置等都在所难免。我们恳切期望和真诚欢迎来自国内外专家学者以及广大读者的指教和批评。

石仲泉 萧延中

致 谢

我最初对毛泽东思想产生兴趣是在 1971 年。那时，我还是在昆士兰大学主修政治学的本科生。我有幸跟随 C. L. 邱（C. L. Chiou）博士学习中国政治学，而他本人也是一位研究毛泽东的学者。邱有着巧妙的方法向他的学生传递他对该学科的热情，这使我着迷于如下挑战，即阐释马克思主义是如何在中国被理解和应用的，尤其是在“文化大革命”后期。

被邱所激发的热情一直持续到我在伦敦大学东方与非洲研究院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在那里，我受到世界上最知名的毛泽东研究学者施拉姆的指导。关于学界对于很多问题的解释，施拉姆和我都不认同并将继续质疑之。施拉姆给我上了很重要的一课，即只有详细地分析毛泽东的文本，才能理解毛泽东及毛泽东思想的重要之处。许多关于毛泽东的论著都明显忽略了一些常见的证据，施拉姆丝毫不能忍受这种傲慢的行为。他本人在阐释毛泽东思想的时候从来不会脱离文本，这在这一不可避免会有意识形态介入的领域，无疑代表了一种有益的力量。施拉姆同时也教会我从英文学术版本中吸取精华的重要性，不过他在这个领域的贡献却是我不能企及的。他主编的“毛泽东的权力之路”系列丛书取得了非凡的成就，尤其让以英语为母语的人都可以很好地理解毛泽东 1949 年之前的文本。这一系列丛书使人们更容易了解学术界关于毛泽东及其思想的争论，人们对于这一主题的兴趣大部分都归功于他。

这两位学者在我早期研究毛泽东思想的过程中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我从他们那里得到了巨大的鼓励和帮助。同时，我也对以下人士表示真诚的感谢：格里菲斯大学语言与应用语言学院的王玉平（音）博士近 20 年来给我提供了中文语言方面的帮助；原任教于杜克大学、现处于半退休状态的阿里夫·德里克（Arif Dirlik）教授，一直以来都很支持我的研究并且仔细阅读过我写的东西；伦敦大学的迈克尔·达顿（Michael Dutton）教授以及新英格兰大学的保罗·希利（Paul Healy）博士在我最需要的阶段，从理论上对我产生了重大影响。另外，中国许多研究毛泽东的学者都对我的研究提供了帮助，在此就不一一列举了。我对他们每一个人都心存感激，尤其要对其中三位特别提出感谢。当我为毛泽东思想的内涵绞尽脑汁的时

候，四川大学的冉昌光教授和黎永泰教授以及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的毕剑横教授给我提供了大量帮助。

我的很多同事也从多个方面对我的研究提供了支持。非常庆幸，在我1981年加入现代亚洲研究学院的时候，科林·麦克拉斯（Colin Mackerras）是学院的领导者，他在教学和研究方面都是很好的指导者和合作者。同时，我也要感谢约翰·布彻（John Butcher）副教授提供的帮助表示感谢，他是真诚地给人灵感的老师和同事。道格·史密斯（Doug Smith）在图书馆和课堂上对我的工作给予了大力支持。我也真诚地感谢近几年来我的研究助理刘先（音）博士。

一直以来，我觉得亏欠最多的是我30年来最亲密的伴侣吉尔·肯尼（Jill Kenny）。她的关爱和支持使得我的教学和研究目标不断地得以实现，我对她的感激之情无以言表。

本书中的章节吸收利用了我之前发表在下列刊物上的一些文章，但根据情况的变化都进行了彻底的修改、更新和扩充：《毛泽东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载《澳大利亚中国事务》，1983年1月第9期，17～34页；《毛泽东与历史：谁来评价，如何评价？》，载《澳大利亚中国事务》，1985年1月第13期，121～136页；《毛泽东及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见马克林、尼克·奈特编著：《马克思主义在亚洲》，第四章，伦敦和悉尼，克鲁姆海尔姆出版社，1985；《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研究领域的经验主义和话语》，载《澳大利亚中国事务》，1986年7月第16期，7～22页；《矛盾和新民主主义论：从对比的角度看毛泽东思想和社会变革的原因》，载《关心亚洲学者委员会通讯》，第2辑（1990年5—6月），第22期，18～34页；《政治愿景：历史时间和毛泽东思想的未来，1936—1945》，载《东方研究丛刊》，第二辑（1991），第29期，139～171页；《从和谐到斗争，从永久和平到“文化大革命”：毛泽东思想多变的未来》，载《中国信息》，第2/3辑（1996年秋/冬），第11期，176～195页；《毛泽东和中国革命的领导阶级》，载《中国信息》，第三辑（1997冬—1998年），第12期，28～45页；《毛泽东思想中工人阶级的权力和国家形成，1931—1934》，载《现代亚洲杂志》，第一辑（2002），第32期，29～46页。我很感激这些刊物的编辑和出版商提供并许可我使用版权材料。

本书第四章在《毛泽东和农民：革命战略形成中的阶级和力量》一文基础上写成，该篇文章首次发表于《中国报告》，第一辑（2004年1—3月），第40期，49～76页，社会发展研究版权中心，德里，2004。版权所有，如重新刊发，须经版权所有者和出版商许可。

目 录

第一章 前言：再思毛泽东	1
第二章 方法论问题一：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文本的再思考	12
经验主义：阐述与批判	14
毛泽东文本：读者的作用	17
毛泽东思想的影响：系谱的问题	20
连续性与非连续性：分期的问题	26
结论	34
第三章 方法论问题二：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观	36
存在一个“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吗？	38
毛泽东是马克思主义者吗？如果是，又是哪种？	42
结论	50
第四章 毛泽东思想中的工人阶级与农民（1923—1945）	52
联合农民（1923—1927）	57
农村革命（1927—1930）	63
工人阶级力量与建立政权（1931—1934）	68
抵抗与改革（1937—1945）	78
结论	82
第五章 政治和构想：毛泽东思想中的历史分期与未来思想（1937—1945）	87
中国传统中的历史分期和未来思想	90
马克思主义传统中的历史分期与未来	93
毛泽东思想的双重分期：“三时代”和“五阶段”	98
历史性未来：永久和平时代，共产主义时代	103
政治和构想：未来对现在的影响	108
结论	113
第六章 毛泽东思想中社会革新理论的马克思主义维度	115
基于对毛泽东三宗文献的研究（1937—1940）	115
《矛盾论》：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	117

《论一党专政》：阶级与政治	121
《新民主主义论》：经济、政治、文化	123
“根据”：经济和政治	126
“政治”与阶级斗争的调整	130
“政治”与政府的作用	134
文化的历史作用	136
政治与意识形态	140
结论	142
第七章 毛泽东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144
毛泽东与科学：普遍性与特殊性	146
毛泽东视野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形式	150
第八章 通往中国社会主义道路上的毛泽东（1949—1969）	158
毛泽东对 1955 年至 1956 年事件的回答	160
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	162
“不断革命”	165
“大跃进”	167
20 世纪 50 年代到 60 年代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	170
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和“文化大革命”	173
结论	178
第九章 从和谐转向斗争、从永久的和平转向“文化大革命”：	
毛泽东思想中变化的未来	179
悲观主义和革命斗争：20 世纪 50 年代和 20 世纪	
60 年代早期	182
矛盾的普遍性和无限的生产力	185
“大跃进”中的“乌托邦主义”	187
“文化大革命”：告别乌托邦	189
从和谐到斗争，从永久和平到“文化大革命”	190
注 释	194
参考文献	241
索 引	257
译后记	272



第一章

前言：再思毛泽东

我们认为，在毛泽东去世大约 30 年后重新思考他的思想是十分必要的，其原因表现在多个方面。首先，在过去的 30 年中，中国官方曝光了大量之前鲜为人知的毛泽东的文献。中国出版并广泛宣传这些文献，中国的媒体和学术期刊也对其进行了详细的阐释，若非有隐蔽的政治动机是不会如此的——对于这一点我稍后会谈到。不管发布这些著作的动机是什么，它们从根本上扩大了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研究赖以存在的文本域，同时，由于文本域轮廓的显著改变，我们对一些传统的阐释产生了怀疑，早期的讨论同样需要被重新开启。因为这些文献见证了很多新主题——文学的、哲学的、意识形态的、军事的、政治的、经济的、个人的——它们是毛泽东思想的核心。这些文献成为我们阐释毛泽东思想时要面临的挑战，因为它们代表了需要探索的未知领域。 1

其次，从毛泽东登上历史舞台之后，这个世界以显而易见的代价发生了很多次转向。转向给中国和国际社会都带来了深刻的变化，这些变化则不可避免地影响到我们理解毛泽东的方式。毛泽东在晚年时仍然会谈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即使这一运动内部存在着严重的分裂。苏联的存在和冷战引发了国际的紧张态势，那时的中国依然坚持毛泽东模式的领导。一些观点——这些观点为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的彻底变革提供了支持——在当时被认为是异端邪说，它们在“文化大革命”的猛烈攻击下全线溃退。但是在短短几年内，“文化大革命”中所谓的异端成为新的正统思想， 2 它们给中国的经济和社会结构带来了显著改变，这些改变至少可以同毛泽东任何一项雄心勃勃的政治运动相媲美。中国朝向市场经济的变化、苏联日趋衰落并于 1991 年最终瓦解，这些事件伴随着并部分地加速了西方左翼的实质性消亡，很多国家的共产党都不再执政。中国改革事业的胜利及

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跃进，在西方国家得到了回应。在这些西方国家中，新保守主义获得了胜利。在中国和西方国家，认为可能通过有意识的政治运动实现人类平等的信心受到了严重侵蚀。上述变化使得前辈们主张平等的社会主义观念，尤其是毛泽东一代试图通过革命来实现社会主义的方式，变得更加难以理解，更不用说被证明。政治运动意义上的“社会主义”的衰落及其意识形态吸引力的减弱，不仅改变了过去人们在经验意义上使用该词语的方式，而且改变了该概念所蕴涵的价值标准（好的和坏的、理性的和非理性的、相关的和不相关的）。但是，社会主义的价值观念激励着毛泽东和他所属的革命一代，这些观念对他们来说是切实的、似乎可以实现的，正如激励着后续一代那些不同的价值观一样。

然而，显而易见的是，许多评论毛泽东生活和思想的人不再愿意真实地对待毛泽东所坚持的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信念。不同时代的人具有不同的意识价值和形式，这些差异成为当前的限制，它阻止人们去认可某种世界观的解释性价值，原因是这种世界观和目前流行的世界观极为不同。因为如果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在当下是毫无意义的，那么它们在当时又何以具有意义呢？对毛泽东思想的阐释不可避免地要用到许多概念，如“社会主义”——这一词语的意义和价值一直处在改变和动摇中。如此一来，那些重视毛泽东的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学者便具有了某种负担和责任，他们面临着标准的挑战，他们要合理、公道地理解毛泽东的文本，要逆当下流行的观点而上。他们坚持认为，尽管“社会主义”在最近的30年中被削弱了，但它仍然是理解毛泽东思想和行动的相关性范畴。

3 因此，当前和最近的过去形成了棱镜，毛泽东的生活和思想通过它得到折射。随着棱镜的变化，折射出来的图像也会发生变化。对毛泽东及其思想的研究无法不受到连续的时代语境的影响；毛泽东的研究者目前已形成的优势不可避免地影响着他们的观点和解释。考虑到持续变化的政治和知识环境——毛泽东研究正是在这一环境中得以继续——要终止关于毛泽东生活和思想的讨论是不可能的事情。在一种历史语境中不证自明地被宣称是正确的结论，会在另一种历史语境中丧失其合理性；在某个领域流行一时的、坚守着某种特定价值和视角的学术观点，在被其他知识风尚超越时也会失去自己的光彩。从这层意义上来说，对毛泽东的评价一直都是刚刚开始，一直都在等待更进一步的重新思考。

把毛泽东研究视为一个过程的现象在后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最为明显，这反映了一个特殊历史时期的主导价值。1981年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尝试公平地评价毛泽东的成就与失误。在这一决议发布之后，中国的学者和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家们开始转向审视那些先前被视作禁区的毛泽东的生活和思想，但是他们再研究的方式明显地体现了新兴的“真理政权”^[2]的视角和价值。邓小平理论是一个广泛的综合体，它包含了经济改革和社会改革的内容，以及官方对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及毛泽东在其中角色的重新阐释，由此构建起一个清晰的框架和范围，在这一框架内，对毛泽东著作的说明和反思得以继续展开。大体上来说，中国的学者和党的理论家们已经能够恰如其分地引导自身和学术的方向；他们吸收了流行的正统观点，并且找到了通往自己学术研究的出路，这一过程往往是相当无意识的。^[3]我们可以发现，在后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大量关于毛泽东的研究都大体上遵循着邓小平的论断——毛泽东“对中国革命的功绩远远大于他的过失”，以及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决议中所批评的毛泽东思想和政策的某些方面理所当然地成为学术研究所批判的合理对象；但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新产生的大量学术文献则从大体上表达了强烈的肯定性观点。^[4]总之，较之以前，在后毛泽东时代的中国，研究毛泽东的整体氛围变得越来越具开放性和批判性，而限制依然存在，这些限制源自盛行的政治风气。

同样，在西方，由于政治和社会环境发生了变化，关于毛泽东的研究也需要改变。最值得注意的是，学者们对毛泽东的兴趣骤减，因为他们将注意力转向了看起来似乎更局部的问题。在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关于毛泽东的学术出版物像汹涌的洪水般被大量出版，时至今日洪水已变为细流，只有一小部分“顽固的”学者仍然保持着对毛泽东的兴趣，我便是其中之一。这些学者仍然坚信，毛泽东的思想、政策和历史地位依然具有学术价值。这些学者的任务变得更加艰难，因为在中国和西方出版了一大批关于毛泽东的回忆录和传记，它们或是色情的或是攻击性的或是二者兼有之。^[5]这些丝毫不加掩饰的研究常常描绘出极端负面的肖像，从而使任何关于毛泽东的严肃性学术研究都显得毫无价值。那些讲述毛泽东在两性问题上的错误、复仇的个性和古怪的行为的故事，基本上都是为了淡化毛泽东的生活和思想的意义及其在中国和世界历史中的重要性。这些

4

人身攻击的谬论已经产生影响，尽管事实显然并非如此。不管它们是真的抑或假的，公平的抑或不公平的（大多数是后者），这些关于毛泽东个性和个人生活的叙述促成了一种风气，在这种风气中，妖魔化毛泽东被假定为研究兴趣的唯一恰当目标。

本书坚决拒绝这种流行观点，它基于以下假设：对毛泽东思想的学术化研究依然具有显著意义。了解毛泽东思想的来源、概念框架及其发展，有助于人们解释他在政治领域的行为，有助于人们打开一扇窗来窥视那些影响毛泽东又反过来受他激励的革命知识分子的世界观；同时，它对于人们熟悉毛泽东时期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意识形态和知识世界也是非常必要的。这些当然不是无关紧要的问题。除此以外，人们围绕毛泽东思想所讨论的一些问题，例如，关于中国革命中农民阶级的角色问题，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性质和影响问题，马克思主义以及其他欧洲社会思潮在20世纪上半叶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影响问题等，与20世纪中国历史上关于其他问题的争论息息相关。研究毛泽东思想就必须研究知识、政治、文化是如何塑造毛泽东并反过来受他影响的，离开了这种研究传统，对现代中国历史的其他讨论都是不够完整的。

- 5 理解毛泽东思想不仅对于理解过去的中国极具意义，对于理解当今的中国也同样如此。尽管自从1976年毛泽东去世之后，中国的知识界、意识形态和政治环境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但他的影响绝没有消失。中国的历史学家和政治学家仍然置身其中的知识语境，在很大程度上源自过去；他们理解问题的框架和认识方法并没有完全摆脱中国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时期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影响。从意识形态层面来看，中国共产党仍然坚持着1981年决议形成的框架——批评毛泽东的失败之处，承认毛泽东在中国革命胜利和早期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功绩。中国共产党当然没有抛弃毛泽东和他的思想，很多党的理论家仍然继续致力于将毛泽东的革命的马克思主义与当今党的领导者所坚持的以市场经济和全球化为导向的开放的中国相调和。^[6]毛泽东的思想意识继续时而强烈、时而微弱地与共产党的意识形态产生着共鸣，特别是在坚持强调中国仍然是“社会主义”国家方面。从政治层面来看，毛泽东的影响明显地体现在中国共产党的内部结构和组织实践中，它们都具备毛泽东所接受的列宁主义党建理论的基本特征。在知识界、意识形态和政治的每一个领域中，毛泽东继续产生着长远的影响。

但是，毛泽东的影响绝非仅仅存在于权力通道和学术界中。“毛泽东复兴”不时地出现在中国人民中间，这表明了毛泽东在大众意识中的持续在场。其中最著名的一次复兴发生在1993年官方举行的纪念毛泽东100周年诞辰时。这次特别的“毛泽东复兴”发生在多个层面上。最表面和最明显的表现形式是有声有色的毛泽东纪念品贸易（打开即奏《东方红》的印有毛泽东像的打火机、如同圣克里斯托弗奖牌一样挂在出租车里的毛泽东像章、毛泽东日历和徽章）。^[7]一个更为实质性的表现是，关于毛泽东生活的书籍和文章源源不断地出现，其中一些披露了毛泽东个人和两性生活的私密花边新闻。^[8]除了官方举办的纪念毛泽东百年诞辰活动（会议、学术出版、展览、电影），民间流行着一股对这位前领导人的怀旧之情。这种怀旧之情是一系列情感的外在表达。从最简单的意义上来说，它表达的仅仅是人们对这位前著名领导人的奇闻怪事的纯粹好奇心；从深层意义上来说，它表达的是很多中国人在社会变化的步伐和走向中的不安全感；它同样表达了人们对过去可想象的确定性的怀念。因此，非官方的“毛泽东复兴”尽管刚刚起步，但却表达了人们对执政党改革议程的反思，正因如此，这种毛泽东复兴能带给中国领导人一些警醒。^[9]“毛泽东复兴”所暗含的对中国改革进程的批评不容易被控制，它置中国领导人于不公平的地位，因为这些领导人被1981年决议的内容所束缚，在这个决议中，毛泽东被认为是一个有瑕疵的领导人，不过他的功绩远远超过他的错误。人们对毛泽东的兴趣和尊重是无法被制止的，除非同时质疑后毛泽东时代领导人的合法性，以及共产党的意识形态的一致性，这种意识形态是建立在毛泽东意识形态的基础上的，并且无法避免地和它纠缠在一起。

6

1993年的“毛泽东复兴”并没有彻底消退，从那时开始，大众对毛泽东的兴趣时而衰退，时而泛滥。这一现象随时提醒着以下问题，即毛左翼是一份复杂且不稳定的遗产，他们在理解毛泽东生活和思想的时候，不会轻易受到已被认可的1981年决议框架的束缚。对不同的中国人来说，毛泽东代表着不同的意义，他们多样化的理解常常被调动起来以达到不同的效果。这些效果的范围很广，从简单（挂毛泽东日历以起到装饰效果）到复杂（借用毛泽东的名义以动员和支持反对贪污的斗争）。对毛泽东及其思想的建构和运用会经常变化，不仅仅是因为毛泽东的著作以及关于毛泽东的著作是大量的、多样的、复杂的，还因为那些激起人们对毛泽东兴

趣的焦点本身就是多样和易变的。

毛泽东及其思想在中国和其他地区的持续影响（尼泊尔毛主义革命运动的高涨）进一步证明了继续研究毛泽东思想的重要性。但是，应该怎样研究毛泽东的思想？我们应该如何完成这一复杂的任务？正如我在本书第二章和第三章中将要阐述的那样，研究毛泽东的学者用不同的方式回应了这些问题，他们形成了不同的价值观和方法论，并且提出了不同的问题。不可避免的是，他们的结论是多样化的，并且绝对不存在无争议的研究方法。我对毛泽东思想的研究同样由特定的思维方式所决定。首先，涉及一个可以被称作制图法的方法，这一方法使毛泽东大量的文本〔“著作”（毕生之作）〕被概念化为一个领域——正如米歇尔·福柯所描绘的那样。^[10]

- 7 类似于物理领域，这一特定的领域有自己的边界、轮廓和可辨认的标志。它随着新文本和新信息的披露而改变，也会随着一些文本偶尔从档案中被删除而改变。^[11]因此，毛泽东研究的领域需要定时重绘。很多学者已经探索了这一领域，但由于持有相异的研究目标，因此他们绘制的地图提供给人不同的是不同的有时甚至是矛盾的观点。我自己在这一领域中摸索了大约35年，在这期间它的风景已经发生了显著变化。过去我已经探索并“绘制”出的领域现在已经变得大不相同，因此我有责任来修正自己的结论；还有一些领域基本上未被探及。

将毛泽东的文本看作一个有待开发的领域意味着需要“指南针”。如果行进没有明确的方向感，旅程的最后便无法达到明确的目的地。我们需要一个清晰的框架来提出问题，以供我们审视文本。我的兴趣在于：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历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以及它们被介绍到中国并被中国知识分子和政治活动家（尤其是在20世纪20年代早期到30年代）接受、阐释、发展并应用于中国革命和1949年之后社会主义建设的进程。正是这一兴趣指导着我对毛泽东思想的研究。我的兴趣还在于像一个历史学家那样去思考一种产生于欧洲的激进的意识形态传统是如何在一个完全不同的历史和文化背景中发展起来的。我的倾向是接受由中国的革命主义者和知识分子表现出来的——从其表面价值来看——对马克思主义的转向和坚持。但在研究毛泽东思想和中国革命的知识分子学者那里，这并不是一个普遍的趋势；的确，不幸的是有一种相反的趋势，它对马克思主义的信念持拒绝或贬低态度。他们这样做的理由各不相同，但一般而言是因为他们

拒绝承认中国人能够理解一种属于欧洲知识体系的思想。另外一个原因则基于这样的政治前提：由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在中国被加以运用的方式是不恰当的，因此他们无法认真对待那些拥护这些观点的人的信奉和理解水平。我反对以上两种观点。我认为，这些恰好证明中国的革命者和知识分子，无论是从理智上还是从政治上，都是真正信奉马克思主义的，他们努力去理解这一具有强烈的理性主义风格的思想体系的复杂内容和形式，他们中的很多人变得精通这一思想。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会必然接受那些基于与马克思主义的接触而产生的观点和价值，更不用说接受这些观点和价值所可能激发的政治行动。但必须承认的是，试图去理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在解释他们所倡导的这一具有影响力的思想体系时所采用的方式，这一做法是正确的。对我来说，历史学家研究的基础前提是，从研究对象的情况出发去理解他们的观点，但是这一主张在关于毛泽东思想和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中并未被广泛采用。^[12]

8

在我看来，人们没有兴趣去认真对待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所宣称的马克思主义信仰的一个原因是，那些评价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的学者们本身对马克思主义的认知是相当匮乏的。缺乏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充分理解，并没有阻止一些学者发表相当过分的言论，他们通常信口开河：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是不充分的。^[13]相当令我惊讶的是，对于历史、理论和马克思主义文本的熟悉使我得到了一些没有被其他研究毛泽东的同行所分享的——或者说没有被广泛分享的——关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历史的观点。^[14]我过去提出过，研究毛泽东的一个基本要求是要适当地熟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因为毛泽东反复强调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他的著作中到处都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引用。但是毛泽东研究的历史证明，情况并非如此。

因此，在我探索毛泽东的文本领域时，我常常提醒自己去寻找象征毛泽东思想中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维度的标志，但是我并没有忽视中国的知识传统对他的影响。通过分析延安时期毛泽东的历史哲学思想可以非常清楚地发现，他在对历史时期和未来社会的认知上强调了乌托邦的主题，这一主题既是中国的也是马克思主义的传统。然而，有启发性之处在于，乌托邦思想在中国的传统中并不像在西方的传统中那么重要，而且毛泽东是在试图从深远的历史中对中国的革命和抗日战争进行定位的时候转向了乌